城市社会的创新逻辑

——基于城市哲学与城市批评史的研究视角

陈忠,上海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上海 200235

摘要: 创新是理解和影响城市发展周期兴衰的重要线索、深层机制。反思城市史,城市与创新相互生成、相互促进。城市的吸纳与聚集效应,为创新提供重要动力;城市的群落与区域效应,为创新打开新的空间;城市的确定与意义效应,为创新提供重要保障。当代城市创新在价值规范、风险管控、动力持续等方面面临一些深层次问题。推进创新目标的自觉、创新格局的完善、创新成果的共享,营建具有人文底蕴的城市创新,对我国城市社会的健康可持续意义重大。

关键词: 城市社会; 创新逻辑; 创新效应; 创新问题; 人文自觉

作者简介: 陈忠,哲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发展哲学、发展伦理与城市哲学。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城市哲学与城市批评史研究”(11AZD058)

收稿日期: 2016-03-01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7023(2016)05-0001-07

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让创新成为城市发展的主动力,释放城市发展新动能”。城市是多样文明要素的空间化聚集,是人类追求确定性的重要空间形式,是人的社会性、类本质的重要空间实现。城市社会是历史的选择,文明的趋势。创新对城市发展、城市社会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反思城市文明史,城市与创新内在互动;城市是文明的造物,是人类集约创新、共同创新的重要成果;城市又具有创新效应,为创新提供场域、要素、机制、机会。创新决定一个城市的起飞能力,也决定一个城市的续航能力。厘清城市社会的创新效应,反思城市创新的可能问题,确认城市创新的人文底蕴,对于城市社会的和谐稳定、持续繁荣意义重大。

一、城市社会的创新效应

城市发展潮起潮落、优胜劣汰,创新是理解、影响城市发展周期兴衰的重要线索、深层机制。在《城市的胜利》的作者、美国经济学家格莱泽看来,纽约之所以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重新崛起、华丽转身,从传统的工业城市变成了金融服务中心,其重要原因在于这个城市的构成具有创新潜质、创新可能、创新弹性,“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传统”,能够不断受到“创新的鼓励”。底特律之所以在上世纪70年代之后逐渐

衰落,其原因在于单一、固化的产业结构,阻碍了继续创新的可能。而底特律之所以曾经繁华,又恰恰是因为其曾经拥有“传统的城市优势,即训练有素的工人、小型的企业家,以及不同行业之间的创造性互动”^{[1]54-55}。创新弹性、创新活力、创新可能的减弱,是底特律面临的最核心问题。

格莱泽主要从城市经济及其与科技的维度讨论城市与创新的关系。事实是,城市既是一种经济存在,也是一种涉及地理、生态、政治、社会、文化等要素或维度的复杂有机体。城市社会是一种新型的、综合性的文明形态、文明阶段,城市社会的创新机制具有深刻的文明意蕴、人文底蕴、文化制约。

在芒福德看来,文化是城市的本质,城市是文化的容器;城市是保存人类多样文明、多样文化的最好容器,也是促进、激发人们进行文明发展、综合创新的最好场域;城市发展、城市创新需要以对生命和文化的尊重为基础。“关键在于我们要认识有机限制的必要性并强制实行有机限制。这意味着要用一种重视生命的目标和利益的经济来取代重视机器的大都市经济。”^{[2]554}

与芒福德的思路基本一致,雅各布斯、列菲伏尔、哈维、索亚等都是人文向度的城市学家,也对城市与创新的关系进行了人文解读。雅各布斯之所以强调保护传统街区,是因为在她看

来传统街区为基层市民、新城市人的创新、创业提供了一种低门槛可能。列菲伏尔认为城市具有政治性,并批评一些区域的精英主导的威权式的城市更新、城市创新,其重要原因是在他看来,这种不合理的城市实践、城市创新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城市权利、日常生活。而哈维、索亚之所以强调城市正义,是因为在他们看来,没有正义底蕴、缺少公正基础的城市创新,会导致深刻的社会分裂、社会冲突甚至社会动荡。

反思城市史,在城市与创新的相互作用中,不断发展与成熟的城市对创新具有重要的场域、规模、激活、加速、保障等效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城市的吸纳与聚集效应,为创新提供重要动力。“城市通过它的许多储存设施(建筑物,保管库,档案,纪念性建筑,石碑,书籍),能够把复杂的文化一代一代的往下传,因为它不但集中了传递和扩大这一遗产所需的物质手段,而且也集中了人的智慧和力量。这一点一直是城市对我们的最大的贡献。”^{[2]580}城市是多样、异质文明要素(人口、知识、资源、技术、观念)的空间化聚集。这种聚集使城市成为强大的需要节点,也使城市创造新供给方式的可能将大大增加。对新的发展要素、文明要素的不断吸纳、聚集,从需要与供给、拉力与推力两个维度为创新提供了可能、动力。“长期以后,城市创造了知识的爆炸;在这里,一个智慧的火花会激发很多的火花。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就是这样一种爆炸,伯明翰和曼彻斯特的工业革命也是如此。20世纪末,纽约的金融业的发展也不过是受到了这样一种创新的鼓励——对风险和收益之间的平衡加以量化的能力。”^{[1]53}

多样文明要素的不断聚集,创新机会加大、速度加快,并最终使城市甚至社会整体以时空压缩的方式加速发展。近代工业革命之所以在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起源,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世纪后期,在西方崛起了一批聚集多样文明要素的新兴的城市。可以说,没有近代早期的城市革命,没有以城市为中心的多样文明要素的聚集,也就没有近代的工业革命,没有现代社会。

反思人类文明的总体进程,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重大创新、重大发明都发生于城市或者以城市为重要支撑。越往晚近,城市对创新的基础作用越明显。在诸多城市与文明史研究专

家眼中,城市是文明的核心标志。我们认为,在总体文明史这个意义上,城市与文明同步,没有城市也没有文明,没有城市也就没有创新特别是创新的普遍化。城市尤其是具有文化融合力的中心城市,对创新一直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二,城市的群落与区域效应,为创新打开新的空间。反思全球城市史,其实并不存在真正的“孤岛城市”,没有城市可以独善其身、独自发展。城市总是以区域、城市群的方式存在、发展。从文明起源看,两河流域由诸多相互联系的城市构成,古埃及文明由诸多城市构成,古希腊文明由诸多相互关联的城市构成,古印度文明、中国古代文明也是由一些相互交往的城市构成。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当代的所有城市都在成为一定意义上的“世界城市”“全球城市”,日益受到各类世界因素的影响,也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世界。“国际化过程既包括从城市中延伸出来发展到全球,又包括从全球延伸进城市的场所。”^{[3]285}城市群、都市区的形成,或者是多点起源,或者是由一个点、几个点向外扩散而成。但不管其如何形成,城市必然以城市群的方式发展却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与现实状况。城市发展的区域化、关系化,为创新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与可能。

雅各布斯对城市群落的创新与发展的作用进行过分析。“在充满活力的发展中城市之间的贸易是多变的,交易的产品不断发生变化,各个城市不断为别个城市创造出新的出口产品,然后在适当的时候用本地的生产来进行替代。这就是欧洲落后城市发展的历程。……它们相互站在别人的肩膀上快速发展。”^{[4]118}虽然,当代的全球化还存在诸多问题,城市之间的交往与交流并不平等,往往更有利于发达区域的发达城市、发达城市的城市中心。但即使是对于欠发达区域而言,城市之间的交流与交往也会为城市发展带来比封闭更多的发展、创新机会。“落后的城市必须最大限度地和其他落后城市进行贸易,否则,它们进口的产品和它们能够用自己的生产进行替代的产品就始终有太大的差距。”^{[4]115}

从逻辑上看,人性与城市性深层同构。城市是人性、人的社会关系本性的空间外化、空间化现实。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指出,人是政治性、社会性的存在,社会性、关系性、非孤立性是人性的重要特点。我们认为,与人性的这种特点对应,群落性、非孤立性、关系性也是城市的重

要特点。对人而言,不同主体之间的交往是创新的重要动力;对城市而言,不同城市之间的交往、竞争、互动,也为城市的创新提供了综合性的动力、机会、资源、空间。当代城市之所以加快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正源于城市群的不断生成,不同城市之间的交流日益便利、竞争日益激烈、发展互补性日益增强。

其三,城市的确定与意义效应,为创新提供重要保障。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城市是人类追求、实现确定性的重要方式。在城市与确定性的关系中,一方面,没有地理、政治、社会等的相对确定、稳定,城市不可能生成、持存。正如《城市的形成》作者科斯托夫所认为,“一个有利的生态基础,一个便利的商易地点,一个涵盖在规模灌溉工程、冶炼术和牲畜驯养术等多方面能力在内的先进的技术基础,一个复杂的社会组织体系,一个强有力的政体,等等——所有这一切都与城市的产生密切相关。”^{[5]33} 另一方面,城市一旦生成,又为人们的创新、发展提供了经过人化的综合确定性。在《全球城市史》的作者科特金看来,成功的城市是能够为人们的创新、发展提供安全、繁荣、意义保障的城市。“有三个关键因素决定了这些城市的全面健康发展,即:地点的神圣;提供安全和规划的能力;商业的激励作用。在这些因素共同存在的地方,城市文化就兴盛;反之,在这些因素式微的地方,城市就会淡出,最后被历史所抛弃。”^{[6]5}

“城市由人,并且为人而建的”^{[5]33}。虽然,城市不是人类存在与发展的惟一空间形式,但在聚集诸多优秀文明要素的同时,城市也聚集了大量的负面因素,并在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下可能成为疾病的重要传播场所,冲突与战争的核心区域。但考察人类文明的大节奏、大进程,可以看到,城市在总体上代表了文明的进步、保障着创新的可持续。在中世纪后期,人们就已经认识到,城市是一个让人感到自由的地方,“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则日益成为当代人的重要空间共识。

从主体层面看,不断完善的城市确定性,也就是城市权利的日益实现。正如列斐伏尔所指出,权利具有空间性、城市性。城市是实现主体综合权利也就是人权的重要空间形式。在权利的空间性这个意义上,所谓人的权利的进步,所谓主体权利的普遍化,只有在城市化的水平与质量达到一定程度才会成为可能。一个区域的

城市化率、城市化质量与一个区域的人权状态在总体上可能呈正比。城市越发达、城市化的质量越高,城市越具有文化与文明多样性,人权的实现与改进越有确定性。主体权利、城市权利的较充分实现,城市型社会特别是大都市往往成为创新的首位区域、核心载体。

二、城市社会的创新问题

创新是城市发展的主动力,城市是创新的核心场域,在创新与城市的相互激发中,人类文明不断发展,城市社会不断完善。但这并不意味着,城市与创新是一种天然的良性互动关系,合理的城市创新可以自发、自然实现。诸多城市病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正源于我们没有处理好城市与创新的关系,出现了城市创新的失控、失范、异化。具体而言,当代城市社会,主要面临以下创新问题。

其一,城市创新的价值规范问题。城市是创新的集中发生地,但问题在于,是否所有的创新都有利于城市,特别是城市的良性可持续发展。对这个问题的反思,深刻关联于人们对城市本质的确认。如果把城市看成一个技术有机体,也就是以技术为核心构架的整体,那么,人们可能会更为注重技术创新,甚至认为通过技术创新可以解决所有的城市问题。如果把城市看成一个管理有机体,也就是以管理、秩序为基础的整体,那么,人们可能会更为注重管理的创新,把寻找更能实现某种秩序的管理作为创新的目标。如果把城市看成一个财富有机体,也就是以财富的生产、创造为核心的整体,那么,人们可能会更为注重财富的获得,将如何获得和增长财富作为创新的核心目标。如果把城市看成一个空间有机体,人们就可能更为注重建筑、道路等各类空间的营建、拓展或重构。但在不断的实践与试错中,人们日益发现,城市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这个复杂的有机体由人所创造,也会反过来塑造人。城市是人的尺度与环境尺度的复杂调适,在本质上是人的尺度的不断空间外化、合理实现。城市社会的推进过程,也就是人的尺度的不断开启、自觉、合理化的过程,需要以人的尺度为根本尺度来建构、发展、更新城市,推进、统筹与城市社会的各个维度的创新,需要建构一种以人为本的城市创新。这个问题的本质是城市创新的价值目标问题:为了什么目的而进行创新,应该以什么作为城市

创新的价值基础。

在哈维看来,面对城市发展中的诸多问题,人们不断地推进金融创新、管理创新、市场创新等方面的创新。但问题在于,这些创新往往只是转移了问题,往往是更有利于甚至只有利于既得利益者,其客观效果往往是少数人、少数所谓的精英摆脱了困境、改善了状况,却产生了更为严重的财富、权利等差距。哈维认为,诸多“案例警告我们,现存的这些似乎‘进步的’方案不仅只是转移了问题,而且在实际中更深更重地把弱势和边缘化群体禁锢在资本流通和积累的链条上。”^{[7]21}他认为,应该充分注重城市发展与城市创新中的城市正义、城市权利问题。“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城市权利日益落到私人或准私人的手里”^{[7]24}。这种缺少正义底蕴的城市创新会在营建暂时繁荣的同时会创造更大的社会不稳定、系统社会风险。

面对这类问题和趋势,哈维、索亚等特别强调城市发展、城市创新的人本基础、人文向度,倡导城市发展、城市创新与城市正义的结合。对城市发展而言,技术、管理等方面的创新必不可少,但这些创新需要得到城市正义的关照、规范和统筹。所有的具体城市创新,特别是技术性创新,都不应脱离城市的总体性、整体性、人本性、全民性。在注重技术创新的同时,需要避免创新的技术中心主义。在注重空间生产的同时,需要避免空间创新的异化。在注重城市财富的同时,需要避免城市财富分配的社会差异过大。以城市正义为底蕴的城市创新,在注重城市外延改变的同时,更为注重城市发展的社会内涵、生活内涵、文化内涵的提升。以城市正义为目的的城市创新,其目标是与城市相关的所有主体的幸福。如果说,城市是一种综合财富,那么作为财富的城市是国家的财富、全民的财富,而不是少数区域、少数人的财富。需要以城市正义为目标,推进一种更具文化底蕴、人文底蕴的城市创新。

其二,城市创新的风险管控问题。在熊彼特看来,创新是一个创造性的毁灭过程,也就是说,创新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创新往往源于解决问题的需要,意味着对既有要素、结构与体系的改变,意味着进入更合理状态的可能;另一方面,创新也会打破已有的平衡,也可能导致系统进入更为不合理的状态,风险与代价是创新与发展中的必然。在贝克看来,现代性包括城

市现代性,在本质上具有风险性,是一种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现代性风险源于人们集体无意识似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观念和行为,也就是人们主要从自我、局部出发设计变革、推进变革,只关注、关心自己在变革与创新中收益、获得,却导致其所在、相关的系统在整体上面临问题、付出代价。

面对不断积累的城市问题、各类城市病,比如能源短缺、噪音污染、交通拥堵、生态破灭、环境恶化、社会分化、贫困问题等,当然需要推进空间、技术、管理等方面的创新。但问题在于,城市是一个高度复杂的有机体,城市存在的任何一个方面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对任何一方面的改革,往往会引致系统的全面变动。这就使城市始终面临创新与风险之间的悖论与张力:一方面,面对问题,必须创新;另一方面,创新又可能导致新的问题。处理不好这种悖论与张力,就可能使城市创新成为一种城市破坏,城市成为一个更为复杂、巨大的风险源、风险场域。

现在的城市,是一种高度人化的第二自然甚至第三自然。一方面,城市的几乎每一个环节基本上都是一种“人造物”“人化实在”,城市运行的每一个方面都需要人为干预;另一方面,这种“人造物”“人化实在”在发展中已经具有了自身的生命,成为一种有规律、韵律的总体性存在,一种需要得到人们敬畏与尊重的有规律的生命存在。正基于此,列斐伏尔将城市比做交响乐,芒福德把城市称为有生命的有机体。而关键在于,一方面,所有的城市都是一种人为有机物,城市发展具有不同于其他发展的规律;另一方面,每个城市生命规律、生命特色又有不同。这一点正如我们每个人,作为生命体,既服从适用于所有人的统一生命规律,又具有相对特殊的生命特殊、存在律动。因此,需要以城市敬畏为基础,推进一种风险可控的城市创新。

其三,城市创新的动力持续问题。城市发展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有机自然发展,一是人为规划发展。所谓有机发展,也就是让城市自然而然地生长,让聚集在城市的人们相对自由地进行空间建构、产业建构、生活方式的形成。所谓人为规划,也就是通过精英和专家设计的方式,推进城市的空间、产业、制度、生活等建构。反思城市史,既有以有机为主而形成的城市,也有以人为规划为主而形成的城市。应该说,这两种进路,都会推动城市创新。有机发展

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微观创新进程,人为规划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宏观创新进程。雅各布斯更为注重第一种城市发展模式,认为这种模式,为城市中的众多普通人提供了从自身条件与环境出发,进行创造和创新的可能,认为这是一种更有利于弱势群体、普通人的发展与创新模式,也是一种更为尊重与保护城市已有特色的创新与发展模式。柯布西耶则更为注重第二种城市发展模式,认为城市发展应该充分运用人类已经发展起来的最新建筑技术、建筑材料。他认为,只有通过精心的设计才能建构能够为更多的人提供舒适、方便生活的现代城市,这种精心设计的城市更能够体现人性的伟大、人性的能力。

比较而言,雅各布斯更为强调对城市既有传统的保护,柯布西耶更为强调对城市问题进行总体解决。一个更为强调微观创新,一个更为强调宏观创新。应该说,这两种进路都是城市发展、城市创新的重要动力。对当代城市发展而言,对这样一个日益复杂的城市社会而言,这两种思路都有其合理性、适用性、必要性。这样,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在一个需要持续创新、合理创新的都市时代,什么样的进路能够保持创新动力的可持续。反思城市史、文明发展史,可以看到,任何一种创新,任何一个政策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都有其生命周期,都有一个从效用提升到效用递减的过程,并往往会进入效用消失甚至反向效用的阶段,正如曾经先进、激进的技术与思想,可能最终沦为阻碍进步的保守力量。

这样,在反思的意义上,比较理想的状态是,激活一种创新,比如宏观创新,比如管理创新,在其充分发挥作用、即将作用丧失时,又激活一种新的创新,比如微观创新,比如社会创新。这样,虽然,从一种具体的创新看,其从兴盛走向了衰落,但对城市社会整体而言,却始终保持着持续创新的趋势。问题在于,由于城市制度、思维惯性、客观条件等方面的制约,很少有城市能够做到这一点,很少有城市能够实现不同类型创新的良好衔接,也就很少有城市能够保持持续创新的良性可持续。纽约、巴黎、东京等城市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城市、全球城市,并保持了其在全球城市竞争中的相对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正源于其聚集了大量文明多样要素,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创新可持续。但是,如果有一天,其持续创新的可能被打破,这些世界

城市也很可能成为曾经的发达城市。如何保持创新的可持续,是所有城市尤其是已经发展起来的城市都会面临的重大课题。因此,需要以合理的城市制度、城市文化为基础,推进一种动力可持续的城市创新。

三、城市创新的人文自觉

近年来,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质量不断提高,这标志着我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文明阶段,从以农村人口为主的社会进入以城市人口为主的城市社会。城市社会不仅意味着人口结构的变革,也意味着产业结构、空间结构、知识结构、观念结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的全面转换。城市社会是人类综合启蒙、综合创新的产物,又要求人们不断进行新的城市创新、新的城市启蒙,以适应城市社会的生活,解决不断出现的城市问题,建构更为合理的城市社会。

我国当代城市化水平的快速提升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的城市化率从20%到50%,只用了20年左右,而西方则用了200年左右。这样一种大规模的快速城市化,时空压缩式的城市化,无疑是我国规模创新、顶层创新、补课式创新的重要成果。这种创新与实践,对我国当代快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也应该看到,这种快速、大规模、“恶补式”的城市化、城市创新,也激活、积累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有可能阻碍我国城市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可持续创新,影响我国城市社会续航能力。实现我国城市社会的可持续创新需要直面、解决以下问题。

其一,创新目标的自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发展包括城市化进程具有比较明显的努力补课、希望赶超的特点。这一特征决定了我国在城市发展中往往更为注重经济目标,更为注重城市产业、空间技术等方面的创新,并又往往以西方发达国家为对标、参照,注重对发达国家经验的模仿、引进、转化,并在一定程度上把西方的城市化规律、城市化观念等同于城市化的一般规律、一般理念。比如,在空间生产的快速推进中,我国不少城市引入了诸多以西方理念,建筑了大量西式的现代建筑,而相对忽视对中国传统的空间与建筑文化的传承,忽视中外空间与建筑文化的深度融合,忽视从自身区域人文地理、文化脉络出发探索有自身特色的中国空间生产的新风格。这实际上反映了我们对城

市发展、城市创新目标的认识还不够自觉,还缺少深层的主体性、民族自觉。城市社会既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也是一个区域性现象,一个以城市为载体实现、发展自身民族性的过程。需要从建构中国特色城市社会,探索中国民族性的现代空间形式、城市实现方式这个维度,理解、统筹、确认我国城市发展中的诸多具体创新。

“中国城市文明能贯通六千年,而且跨越城乡的分野,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人自古已通晓‘天人合一’‘顺天应命’等,利用大自然法则的人地关系的方法和指导原则,来构筑其文明社会。”^{[8]3}我国城市社会的特殊性首先源于我国人地矛盾、人文地理结构的特殊性。城市是人类解决人地矛盾的历史选择,而在不同的国家与区域,其人地矛盾及解决方式、城市化形态却是具体的、有个性的。我国巨量人口,但可利用(可建城)土地相对有限,这样,西方的空间扩散性城市化、高能源消耗式的城市化、消费社会式的城市化并不适用于中国。比如,以洛杉矶等为代表的空间扩散式、高能耗式城市化就不适用于我国的大部分地区。我国幅员广阔,南北之间、东西之间的人文地理条件差异巨大,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诸多不同类型的聚集方式、城镇风格、生活方式。这样,我国的城市社会就是一种由多样态的具体城市社会整合而成的复杂性城市社会,需要充分保护、尊重、发展我国不同区域城市化的特殊性、文化特色。如果没有对各区域已有聚集特色、空间风格、生活方式的充分尊重,我国城市社会建构必然遭遇日益严重的综合问题,付出巨大的综合代价,甚至落入恶性、不可持续的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陷阱。我国城市社会的特殊性也源于我国社会构成方式的特殊性。与西方政府、市场、社会相互分裂甚至对立的模式不同,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我国形成了以非对立思维、融合与整合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与思维习惯。这样,西方特有的城市管理方式可能就很难在中国适用。需要以把握中国人地矛盾、中国人文历史地理、中国社会构成特点为基础,确认我国城市社会的创新目标、发展方向。

其二,创新格局的完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的客观机制是政府为决策主导、市场为执行力量。行政主体、资本主体及其特定的政治经济结合,是推进我国城市发展、城市创新

的客观主导。这种机制是一种特殊的政治经济学现象,同我国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政治经济结构、政治经济心理、深层文化结构都有密切关系。这样一种特殊的机制,是我国的快速城市化得以推进和实现的重要原因,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我国发展取得诸多成就的重要原因。应该承认,在一个文明体的特定的发展阶段,在一个仍然带有深刻丛林性的国际竞争语境下,这样一种以宏观创新、整体创新、顶层创新为主导的机制,有其必然性、合理性。但问题在于,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城市社会的深化,以顶层、宏观、整体为主导的发展与创新思路,将日益遭遇发展乏力、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

在芒福德等看来,精细化、微观完善是城市化的重要发展方向。城市发展、城市社会的进步,不仅需要大格局的建构,也需要无数的、不间断的环节、局部、细节建构和调整。这些环节、局部、细节是非常语境化的、常人化、日常化的,其构成、特点、变动往往只能由身处其中并具体接触的人能够掌握。这样,随着城市大格局建构的基本完成,小格局的建构、细节的调适、环节的完善就成为城市化的重要内容。反思一些先进的发达城市,可以发现,其发达程度不仅体现是具有宏伟的建筑、宽大的道路,也体现在其细节的精致、方便、人性化等方面。这样,在保持宏观、整体、顶层创新的优势前提下,激活、尊重地保护微观创新、细节创新、底层创新,就成为提升城市发展质量、建构更完善中国城市社会的重要选择。这一点,正如吴良镛先生所认为,“中国传统城市规划与建设管理多是‘自上而下’的,其优点是促使建设具有严密的制度秩序,这在中国城市建设史上反映的最为明显。”但“建筑事业的发展基础,又要‘自下而上’,这才具有活力。”^{[9]101}世界城市发展的经验证明,创新往往来自边缘,新的城市往往在传统中心的相对边缘地带崛起。从长期趋势看,微观创新、细节创新、底层创新的推进,不仅意味着我国城市社会的完善,也意味着我国城市权利的结构合理性,意味着城市正义的结构转换,意味着城市创新动力的可持续。

其三,创新成果的共享。在反思的意义上,城市是人的社会性的空间化实现,是所有相关主体进行创新、创造的共同成果、共同财富,任何个体、主体都无法单独进行创新,都需要以其他主体的创造与创新及其成果为条件。在这个

意义上,城市创新具有公共性。城市本身就是一种共同财富。但在现实进程中,由于产权制度、利益格局、行业与区域不平衡、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及各类原由所形成的垄断,具有共同性、公共性的城市财富、城市创新成果却往往表示出一定的甚至鲜明的私人性。城市财富、城市创新成果不仅在城市主体与非城市主体之间(即市民与农民)的配置并不平等,甚至在城市主体之间(不同及同一城市市民之间)的配置也不尽合理。一定限度内的财富差异,对激活、激发人们的创新、创造欲望有现实作用,但是如果城市财富在人们的配置差异过大,特别是出现了差异固化时,就可能引发、积累严重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而导致社会动荡。

考察近年来我国城市发展,可以发现,以住房、货币等形式存在的城市财富在总量上不断增加,但城市财富在城市各类相关主体之间的配置也出现了差异日益拉大的现象。也就是说,作为共建成果的城市财富,并没有真正实现共享。其成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还没有从城市权利的平等及其对城市社会的基础影响这个角度认识与配置城市财富,对我们在设置城市制度时还缺少人文考量、人文底蕴。城市财富是城市权利的现实状态,城市财富的不平等、不合理,从根本上反映了城市权利的不平等。城市权利是进入城市、生产城市、管理城市、享有城市等权利的统一;是机会权利、过程权利、结果(成果)权利的统一。现有的城市权利观念与制度,往往相对侧重建构平等的结果,而相对忽视过程中、机会上的平等。实现城市财富的共享,一方面需要保障所有国民(而不仅仅是市民)进入城市、生产城

市、管理城市、共享城市发展成果的权利,使城市真正成为国家的财富、全民的财富;另一方面,需要着力推进城市创新机会上的平等,使不同区域、不同层次的人们都有创新的机会,都有可能通过自身的勤劳、创新、创造改善自己的状况,获得更好的住房、更好的环境、更好的生活。

总之,创新涉及城市社会、城市有机体的方方面面。人是创新的基础,也是创新的目的。“尽管城市化存在很多共性,但可以肯定不会只有一种,而是有多种路径,各自的成果及相应后果不同。”^{[10]5}从中国实践出发,营建具有人文底蕴、中国文化特色的城市创新,对于中国城市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具有基础意义。

参考文献:

- [1] (美) 爱德华·格莱泽《城市的胜利》,刘润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版。
- [2] (美)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倪文彦、宋俊岭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
- [3] (美) 爱德华·W. 苏贾《后现代地理学》,王文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 [4] (美) 雅各布斯《城市与国家财富》,金洁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
- [5] (美) 斯皮罗·科斯托夫《城市的形成》,单皓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
- [6] (美) 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王旭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 [7] (美) 戴维·哈维《叛逆的城市:从城市权利到城市革命》,叶齐茂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 [8] 薛凤旋《中国城市及其文明的演变》,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版。
- [9] 吴良镛《广义建筑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 [10] (美) 布赖恩·贝利《比较城市化》,顾朝林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The Logic of Innovation in Urban Soc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ity's Philosophy and Critical History

CHEN Zhong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anghai 200230, China)

Abstract: Innovation is a thread and mechanism to understand and affect the development cycle of city. The city and innovation creates and promotes with each other. The attraction and aggregation effect of city is the dynamic to innovation. The community and regional effect of the city opens the new space for innovation. The confirmation and meaning effect of the city provides guarantee for innovation. Now, city innovation meets some problems such as criteria of value, risk control and power continuity. For the health and sustainable of city, we need to change the target and structure of city, share the innovative product, and enrich the humane connotations of city.

Key words: urban society; logical of innovation; effect of innovation; problem of innovation; humanity consciousness

责任编辑 吴兰丽